

## 黄新聪：良师益友司马文森

上

## 良师益友司马文森

4月20日，北京举行《著名作家、外交家司马文森百年诞辰纪念会》，我有幸获赠《纪念文集》和《纪念邮册》，手捧这两件珍贵的纪念品，内心无限激动，思潮起伏，回忆起当年同司马文森先生的一段师生情谊，往事历历在目。我虽未曾同司马文森先生谋面，但六十多年前，我们保持了连续数年的书信交往，他对我的关爱和教导，令我没齿难忘。我早年爱上文学，走上革命的道路，献身新中国的新闻事业；暮年赋闲在家，仍学习孜孜，笔耕不辍，是和司马文森先生对我的教诲分不开的。

1947年夏，我在印尼坤甸《黎明报》当电讯抄写员，经常在编辑部翻阅一些香



著名作家、外交家司马文森

港和星马等地出版的进步书刊。其中我最爱读的是文艺色彩浓郁的杂志《文艺生活》。每当新的《文艺生活》一到，我如饥似渴地从扉页读到底页。一次，我在《文艺生活》底页读到“文艺生活社”（简称“文生社”）征求海外社员的启事，当即给主编司马文森先生写了一封申请参加“文生社”的信。很快便接到他的复信，并附来一个编号为“1948/B23”的社员证。复信说：“文生



社已接纳你为海外社员，今后每月会寄给你一册《文艺生活》

，希望你能多向同学和朋友介绍《文艺生活》。你喜欢写作，如有作品可寄给我们，我们会考虑将你的优秀作品在《文艺生活》上发表。”信末署名：司马文森。

接到司马文森先生这封亲笔信，我激动不已，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，几乎把信都背熟了。一次，在当地青年和学生参加的“热风读书会”活动中，我让大家看了这封信，很多文友都赞赏我成为“文生社”的海外社员，我也趁机开展工作，当场就有几位文友订了《文艺生活》，并委托我通过“文生社”邮购香港出版的“北方文丛”等进步书籍。随后，我到当地“批局”（钱庄）将书款汇去“文生社”。

半个多月后就收到“文生社”寄来的书，司马文森先生还随书附来一封简短的信，列出各书的价目和邮资的明细表以及

余款，同时还给了一份香港出版的进步书籍目录。他那认真负责、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，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。

从1948年初到1950年夏回国前，我几乎每月都给司马文森先生写信，他也从未延误过复信。司马文森先生在信中谆谆善诱地指导我写作。我每有习作必先寄给司马文森先生审阅修改，然后才给《黎明报》或校刊投稿。司马文森先生很少在我的习作上大删大改，而是在信里给我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。我当时喜欢模仿马凡陀和马雅可夫斯基的风格写些短诗。他看过我写的一些诗后给我回信说，初学写诗的人，开始时模仿别人的风格是可以的，但一首好的诗是取决于诗的内涵，因此不必太专注于写作技巧。司马文森先生在信中还说诗歌和其它文艺作品一样，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，希望我多学些哲学理论，树立正确的革命人生观。信中还向我推荐艾思奇的《大众

哲学》和毛主席的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。他的深切教诲至今仍牢记心中。

1949年末，我们学校爆发一场护校斗争。我以此为题材写了一出独幕剧《中华儿女》，我将原稿复写后寄给司马文森先生阅改。司马文森先生阅后给我提了几点意见，大致是：剧本反映海外华侨学生的爱国活动，写得还算成功；不足之处是剧本中有些口号式的句子，缺少生动、活泼和口语化的对白。剧本中还应多写些中间派学生的思想和行动，要注意团结大多数同学。看来司马文森先生对我这篇处女作是看得很认真细致的，我立即遵照他的意见作了修改，后来刊登在《黎明报》的副刊上。过后，有两间外埠华校来信索取剧本，准备将其搬上舞台。

我把司马文森先生当成良师益友，当成最可信赖的贴心人。每当遇到不如意之事或有疑难时，我便想起了司马文森先



北京举行《著名作家、外交家司马文森百年诞辰纪念会》（2016年4月20日）

左起：黄书海（司马同事代表）、司马小萌（司马文森二女）、骆明（新加坡学者）、何瑛（左联纪念馆馆长）、文丰义（八路军纪念馆馆长）、黄继凯（华侨博物馆馆长）、李筱松（李济深女儿）、王克平（王任叔之子）